

清华汇智文库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意识形态 传播结构研究

杜 欣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意识形态传播结构研究》主要讨论“意识形态传播结构”这一新兴论题，关注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典型存在形态，聚焦意识形态传播中观层面的经济、政治、技术三个结构性维度及其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是意识形态传播过程的动态化结果，也是意识形态在传播中生成的自身内在结构。在此基础上，以“传播的意识形态”为理论基点，以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传播为分析对象，归纳其面临的传播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010-62782989，beiqinquan@tup.tsinghua.edu.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意识形态传播结构研究 / 杜欣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4.10. --（清华汇智文库）. -- ISBN 978-7-302-67204-3

I . G206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024MH9479 号

责任编辑：徐永杰
封面设计：汉风唐韵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刘 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s://www.tup.com.cn>，<https://www.wqxuetang.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83470000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天津鑫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30mm 印 张：10 字 数：131 千字

版 次：202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2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8.00 元

产品编号：105398-01

P 前言

Preface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也面临诸多危机和挑战。互联网革命加速演进的同时，意识形态也被吸纳到这一宏大叙事之中，它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和作用的变化越来越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当我们深入其中时，不可避免地要思考现代意识形态的存在形态，从而把握、认识和反思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唯物史观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也为我们研究意识形态及其传播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视角。

本书以唯物史观为研究视角和方法，将意识形态置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维度来予以把握。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只有在传播中才能转化为具体的符号、话语和信息，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发挥其引领、说服、塑造和动员等功能，否则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法发挥其应有效用。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就是传播中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结构就是意识形态传播结构。意识形态自身的传播结构并不是既定的或必然的，而是在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种传播结构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性特征相互联系。意识形态在传播中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结构，即由作为转换技术的媒介、作为转换资源的资本、作为转换能力的权力共同组成的具有内在关联的结构，此为基于传播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中观视角。本书正是以此勾勒出现代时空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变动。

本书分为7章。第1章为导论，主要包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述，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方法及创新之处；



第2章为唯物史观、意识形态与分析框架，主要论述作为分析视角的唯物史观、历史流变中的意识形态和分析框架；第3~5章分别从技术、经济和政治的维度考察意识形态传播中媒介、资本和权力三要素的表征，并对在这三要素制约下的传播活动进行分类研究；第6章为意识形态传播结构的现实观照，以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传播为分析对象，归纳其面临的传播困境，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第7章为结论。

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其他问题和领域相比，意识形态传播结构还有待深入考察和分析，尤其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传播在实践层面上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希冀本书的出版能够在此问题上有所贡献，如有不当或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2024年3月10日

第 1 章 导论	1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3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方法及创新之处	18
第 2 章 唯物史观、意识形态与分析框架	20
2.1 作为分析视角的唯物史观	20
2.2 历史流变中的意识形态	31
2.3 分析框架	49
第 3 章 意识形态传播的技术之维：媒介的结构性定位	71
3.1 作为转换技术的媒介	71
3.2 媒介的结构性定位	77
3.3 媒介运行的逻辑	82
第 4 章 意识形态传播的经济之维：资本的结构性定位	87
4.1 作为转换资源的资本	87
4.2 资本的结构性定位	91
4.3 资本运行的逻辑	94
第 5 章 意识形态传播的政治之维：权力的结构性定位	97
5.1 作为转换能力的权力	97



5.2	权力的结构性定位	100
5.3	权力运行的逻辑	103
第6章	意识形态传播结构的现实观照	106
6.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及其经验	106
6.2	意识形态传播结构的中国解读	116
第7章	结论	137
	参考文献	139
	后记	151



第 1 章

导 论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意识形态研究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当前，我国正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随着各项改革举措的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深刻变革。如何能够在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关键节点上继续稳步推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始终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对于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



的历史性错误。”^①应当说，深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不仅要直面遇到的问题和挑战，还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地推动理论工作的创新。

具体来看，意识形态工作主要呈现为三个维度，即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传播。意识形态建设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和共同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安全是巩固国家政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保证，它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部分与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意识形态传播是意识形态动态化的体现，它作为意识形态从观念化到形态化的重要前提，维系着意识形态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转。其中，意识形态传播是连接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桥梁，只有意识形态得以科学有效的传播，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果才能真正转化为意识形态安全的效果。

尤其进入新媒体时代，各种社会思潮、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难以让受众获得心理上的共鸣，提高舆论宣传水平势在必行。不容忽视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因素的介入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环节都相继出现了革命性变化，意识形态传播领域自然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们在解读这一现象时，不可避免地要深入客观的物质生活中去，通过把握社会客观规律，来认识意识形态传播领域发生的变化。马克思（Karl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创立的唯物史观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为我们研究意识形态的传播结构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视角。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

^①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1.

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也就是说，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不仅直接制约着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它们还是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和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的决定性条件；同时，整个社会结构的层次性分化是有条件的、有规律的、有逻辑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构成整个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独特的传播结构与存在形式。

因此，研究意识形态传播结构必须深入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宏观背景中去，将意识形态传播研究与具体的技术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结合起来，通过对意识形态传播结构的分析来阐明意识形态在传播过程中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并揭示意识形态传播的实质。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评述

1.2.1 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

1. 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

目前，学界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主要持三种观点：第一种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观点认为，法国思想家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Tracy）在其著作《意识形态的要素》中首先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主要是指“理念的科学”或“观念学”，用以阐释流行于社会中的各种观念与偏见的“观念科学”；第二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概念的雏形古已有之，如培根（Francis Bacon）的“四假象说”、柏拉图（Plato）的“洞穴隐喻”都可以被认为是对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第三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概念是在欧洲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开始使用的学术名词，其概念史的开端不早于18世纪。我们认为，培根的“四假象说”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先导，其后洛克（John Locke）的《人类理解论》、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的《感觉论》、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的《论精神》、霍尔巴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的《自然体系》等著作中也都涉及对各种纷繁观念与偏见的批判，这也为后来“意识形态”概念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前提，并由法国学者特拉西首先在出版物中使用。

2. 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识

从历时的角度看，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识是不断发展的。

（1）特拉西创制“意识形态”的初衷是建立一种“观念学”，意识形态是“观念的科学”的代名词，是肯定性概念，后来由于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将观念学者们视作国家秩序的破坏者，遂赋予其否定意义，进而出现其概念史上的第一次意义转向。

（2）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马克思、恩格斯都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个否定性概念，即使马克思没有直接对意识形态作出概念上的界定，但从经典文本中还是可以读出他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持有的否定意味。一般认为，马克思至少表达了三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观点：第一，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意识”或“虚幻观念”，它不是从客观实践中出发，而是从人头脑中的观念出发，企图在遮蔽

现实世界的同时，用观念去统治世界，可以说是一种颠倒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思想观念或活动；第二，意识形态是一种统治思想，代表着一定的阶级利益，它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合法性，通过控制人们的思想活动，来最终达到其统治目的；第三，意识形态是产生意义和形成思想的普遍过程^①。

(3) 列宁 (Vladimir Ilyich Lenin) 不谈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是采用了更加中性的意识形态概念，来描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提出意识形态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②。意识形态概念由此也出现了第二次意义转向，即从一个充满否定性、虚假性、观念性的概念转入中性化发展道路。

(4) 在后马克思时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了不同的构想与再造。如卢卡奇 (György Lukács) 以“物化”作为突破口形成了“物化意识”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 (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 的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理论，曼海姆 (Karl Mannheim) 让“特定的意识形态”脱敏并发展成为一种“知识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以文化工业、技术理性、技术统治为研究主题形成了批判的意识形态理论，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等。

3. 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问题

从国外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围绕意识形态本身的概念、功能、形态等内在特性对其进行分类讨论。如雷蒙德·盖斯 (Raymond Geuss) 把意识形态划归为描述性意义、积极性意义和批判性意义三种类型^③。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将意识形态归为六种：一个社会的信仰和价值；特定集团或者阶级的“世界观”；一个集团从其他集团谋取

① 王晓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75.

②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 [M]．修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3-213.

③ 王晓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88-201.



利益的合法化工具；把人民统一在一个强权下的方法；提升统治集团的欺骗性话语；由社会自身滋生出来的虚假性或者欺骗性的信仰^①。列宁对两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科学划分^②。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做了区分。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把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不同认识进行了分类整理，划出了七种模式：意识形态是有局限性的意识、意识形态概念是一种“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或“阶级合法化”、意识形态是物化意识、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支配权的意识形态、语言异化意义上的意识形态^③。

（2）围绕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活动展开讨论。葛兰西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性的剖析认为，资产阶级主要通过文化领导权获得对被统治阶级的精神控制，用虚幻的自由平等观念掩盖经济的不平等，为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进行辩护，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实践功能，让意识形态斗争表现为权力斗争，葛兰西则把这种权力斗争称为争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唯有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获得领导权，才能最终夺取政权。阿普特（David E. Apter）在其著作《现代化的政治》中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科学为例，从政治政策的制定和效果分析的角度探讨了治理与政治宗教、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指出意识形态有助于在社会中建立团结，有助于个人确立认同^④。自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发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后，围绕意识形态是否终结，学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其中又

① 王晓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05．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26．

③ 王晓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30-340．

④ 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 [M]．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234-256．

以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两人最为出名。福山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中将自由民主制称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而亨廷顿则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终将让位于文明的冲突。直至今日，有关意识形态是否已经终结的争论还在持续。

(3) 围绕意识形态与科技文化活动展开讨论。“文化工业”概念首先由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与阿多诺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在《启蒙时期辩证法》中共同提出，他们认为文化工业时代实际上是商品工业时代。一方面，文化被当作产品按照同质化的标准被生产出来，其内在的价值由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所决定，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与艺术价值不再是价值决定的主要因素，文化成为被贴着“文化”标签的纯粹消费品；另一方面，“文化工业”时代的人们不再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人，而是机器工业的附庸物，丧失了作为人存在的真正价值。相比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把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称为被科学技术统治的“单向度”病态社会，这里面生活着一群“单向度”的人，人们只可按照科学技术化的社会规则和程序进行思考和认知，这里的“单向度”指的是人个性的“单面化”，意指其理性批判精神的丧失。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事实上在提醒人们，要认清科学技术所承担的生产力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职能，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要成为技术的奴隶。除此之外，英国新左派学者还开启了意识形态文化研究的新路径，如汤普森 (Edward Palmer Thompson) 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受到挑战，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生命活力，不过，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造和发展。一方面，将马克思意识形态意指内容从一般思想体系扩展到文化象征形式；另一方面，将马克思意识形态实质从维护阶级统治关系扩展到维护一般统治关系^①。

① 杨生平. 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评析 [J]. 学习与探索, 2015 (1): 22-27.



从国内来看，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围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展开讨论。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规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与经验。有学者认为，在当今世界，一方面，“再意识形态化”有所表现；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以“非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倾向有所增强，需要适应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在有效发挥意识形态自身作用的同时，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社会发展^①。还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在多元文化形态中厘清信仰存在的理由和限度，揭露“贬义化意识形态”两种错觉的同一实质，破解“意识形态模糊论”的挑战和难题，明确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唯物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促进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文化形态转化^②。另外，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理论界和思想教育界需要对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内容和特点做深入的分析，不能简单地推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而应探讨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推动各社会群体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③。应当说，能否实事求是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能否客观地把握社会历史进程、能否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创新至关重要。回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整个探索过程，我们既收获了成功和经验，也吸取了失败和教训，如何及时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最大限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从实践中凝练出新方

① 锥新艳. 深刻把握新中国 60 年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第三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论坛综述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 (1): 154-157.

② 陈东生.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1, 15 (4): 15-21.

③ 冯周卓. 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J]. 道德与文明, 2009(6): 94-97.

法、新思路、新举措，是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

(2) 围绕经济全球化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展开讨论。学者们对经济全球化与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少数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社会思潮多样化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与大学生信仰培育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两大方面的问题。在外部挑战中，有客观经济发展趋势带来的，但更多的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主观故意。在内部挑战中，既有本土因素产生的思潮，也有外部思潮的国内化；既存在于社会，又存在于党内^①。还有学者认为，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是由四方面决定的：一是共产党的性质，二是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三是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需要，四是反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的需要^②。也有学者指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既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意识形态的颠覆战略有关，也与长期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在内容、形式、方式、方法、机制等方面的僵化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有关。一方面要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意识形态的颠覆，一方面要大力改进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增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③。综上所述，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实质上是国家安全问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体现，意识形态安全与市场经济、文化建设、社会稳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足以说明没有意识形态安全，国家的发展也无保障可言。

(3) 围绕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挑战与对策展开讨论。学者们对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新挑战与对策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① 徐成芳，罗家锋．试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J]．政治学研究，2012（6）：19-29.

② 田改伟．试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J]．政治学研究，2005（1）：28-39.

③ 黄旭东．意识形态建设与国家安全维护[J]．湖北社会科学，2009（7）：16-18.



改革开放条件下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转型时期我国意识形态的变迁问题、网络传播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意识形态发展过程，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理论创新过程^①。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意识形态之所以成功转型是由于赋予了意识形态原本应有的功能和地位，同时与渐进温和式的改革并举^②。但也有学者指出，网络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及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环境带来了强烈冲击，强化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组织保障、思想保障、制度保障、载体保障是有效的路径选择^③。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挑战，诸如网络传播、经济全球化、利益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思潮等都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只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主动着眼于对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度剖析，积极查摆问题与寻找对策，才能不断取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的胜利。

1.2.2 关于传播结构研究

1. 传播结构的基本模式

“结构”指的是关于事物之间及其诸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传播行为只发生在传播关系中^④，而人类的传播行为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必然具有独特的传播结构与存在形式。对于传播结构或过程的研究最早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其著作《修辞学》中就将“讲者、听者、内容”作为演讲的三要

① 萧功秦.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 [J]. 天津社会科学, 2006 (4): 45-49.

② 茅晓嵩.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意识形态的转型及其发展 [J]. 重庆社会科学, 2008 (8): 12-17.

③ 魏晓文, 邵芳强. 论网络背景下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J]. 思想教育研究, 2014 (6): 29-33.

④ 威尔伯·施拉姆, 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 [M]. 2 版.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40.

素，这事实上展现了传播结构研究的最朴素状态^①。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上看，传播结构主要分为三类：单向传播结构、双向传播结构、整体互动传播结构。

(1) 单向传播结构。在传播学研究史上，第一位提出传播过程模式的学者是美国的哈罗德·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他拓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将结构与功能的框架放置在整个传播过程中：这个过程的结构由五个要素组成，呈线性的状态，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了什么效果” (5W 模式)，涉及守望环境、协调社会各部分以回应环境、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三大具体功能^②。从宏观的社会角度看，传播结构是传播社会功能展现的逻辑过程，这是拉斯韦尔所倡导的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研究传播学的路径。拉斯韦尔的研究主要突出了“通过什么渠道”和“取得了什么效果”这两项关键要素，将媒介与效果研究置于整个传播过程的中心地位，媒介取向和效果取向的研究也成为传播学史上重要的两个研究方向。

大约同时代，C. E. 香农 (Claude Elwood Shannon) 在其著作《传播的数学理论》中提出了一种线性的、从左至右的传播概念，其中涉及信源、讯息、发射器、信号、噪声、接收到的信号、接收器、信宿，这些基本组成部分构成了一个传播结构的基本方面，尽管这个研究主要是描述电话传播系统的，忽略了非语言的传播，但这至少说明了传播活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传播的过程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阻碍和影响，这也为后续的传播结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③。不过，拉斯韦尔的“5W 模式”和香农的传播模式都是从单向的角度描述了整个传播过程，虽然拉斯韦尔本人着重强调了

① 张国良. 传播学原理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37.

② 哈罗德·拉斯韦尔.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M].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 35.

③ E. M. 罗杰斯. 传播学史: 一种记传式的方法 [M]. 殷晓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426-431.



“社会传播”，但从他对传播结构的表述上并没有过多地涉及传播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依旧没有揭示出传播结构的系统性、动态性和多维性特征。他的“5W模式”与香农模式的缺陷也是明显的：缺少反馈回路，无法体现出人际传播或者大众传播的互动特性；直线式传播模式不能体现传播过程中各要素、各环节之间的深层结构关系。一般认为，如果只从传播过程自身来考察传播结构的话，还不能揭示其结构的内在本质，必须将其放置在互动的结构中去，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控制论模式开始成为研究的主流。

(2) 双向传播结构。双向传播结构也称为控制论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传播结构的互动特征，增加了反馈回路，不过它仍然将传播过程视为单一的封闭过程。从历史上看，双向传播模式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传播过程视为“双向循环式”，并引入“反馈”机制。如奥斯古德（Charles Egerton Osgood）对“申农—韦弗”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扬弃，他认为在传播活动中的个体既可以是信息的发送者，也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展现出编码与译码双向行为。

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奥斯古德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人际传播模式：传播过程是一个循环过程，传受双方在编码、释码、译码和传递信息、接受信息时，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且是一种往复循环、持续不断的过程。同时，施拉姆的控制论模式还引申出一个“传播单位”的概念，即任何传播活动的参加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可视作“传播单位”，都兼有两重身份——“传者”和“受者”，以及四种功能——“传送”（发信）、“接受”（受信）、“编码”（符号化）、“译码”（符号解读）。这里的传播单位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这里的媒介既可以是媒介组织，也可以是亲身媒介^①。事实上，在施拉姆1954年提出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中则将媒介组织置于核心地位，这个模式主要是由大众传媒和受

^① 张国良. 传播学原理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44-45.

众构成，它们之间是一种传达和反馈的关系。大众传媒通过与信源的联系并将大量的信息复制、加工、传递到受众一方，成为联系大众传播过程的核心传播者，而每个受众扮演着译码、释码和编码的三重角色，它们从属于群体，且能够对信息进行二次加工并将信息反馈回媒介组织，从而完成一次信息的完整循环。

施拉姆提出的人际传播模式侧重说明人际传播过程中点对点的关系，而他的大众传播模式则充分展现了信息传播点对面的特征。在双向传播结构研究的成果中，德弗勒将信息论引入传播结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互动过程模式，即在传播过程中补充了反馈的要素、环节和渠道，使传播过程更加符合人类传播互动的特点。与此同时，这个模式还拓展了噪声的概念，认为噪声不仅对讯息，而且对传达和反馈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要素都会产生影响^①。

(3) 整体互动传播结构。1959年，赖利(Reilly)夫妇提出了传播的社会系统模式，即将传播过程置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大环境中，试图说明群体、结构、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赖利夫妇提出的系统模式使“基本群体”受到“更大社会结构”的制约，突出了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其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特征更加明显，能够将传播活动的运行环境、制约因素、内部机制等充分展现出来。

1963年，德国人马莱茨克(Maletzke)在其大众传播过程模式中的描述就更为精细，他将传者和被传者的自我形象、个性结构、工作环境、社会环境、媒介压力、讯息压力、内容选择、感受和效果等要素都纳入传播结构中，从更大的范围内描述了信息传递的整个过程，进一步地丰富和发展了自线性传播模式研究以来的各项成果，兼容并包的优势十分明显^②。正如麦奎尔(Denis McQuail)

①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53.

② 李元书. 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 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 126-134.



认为,该模式如此详尽,可以作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大众传播过程的相关因素的一份清单^①。单就这一点来看,马莱茨克提出的大众传播模式,以系统论的视角综合考虑了社会传播活动中的多重因素及其相互制约关系,涉及一系列社会和心理因素,从宏观上把握了传播过程的总体情况。

2. 传播结构的动态与静态

如上所述,自拉斯韦尔开启的线性传播模式到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的研究历程,充分反映了学者们对传播结构研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努力。但也有学者指出,拉斯韦尔的“5W模式”的传播结构其实只是一种对传播过程的静态的、物理过程的分析 and 描述,在这一结构模式下,所有的信息流程被简化为物理信号的运行,至于结构本身的特征、构成性、能动性以及社会话语生产性等问题,在这一结构模式中显然没有体现出来;应当从传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互动性、传播结构的意义生产性、传播结构的社会隐喻性、传播结构的实践性去探究传播本质的深层意义,深刻认识传播结构的内在关系模式特征^②。这也带出了传播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动态传播结构与静态传播结构研究的分野。有学者认为,用“实体间的关系”来解释“结构”,或用物理学中的力学结构类比“结构”,脱不出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理论范畴,关注的是静态与稳定的结构,对结构动态变化过程的解释力不足^③。

从传播的定义来看,社会互动论的创始人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就强调了传播的社会关系性,美国学者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Santiago Peirce)则把传播看成是观念或意义(精神内容)的传递过程,他们两人也开创了界定传播概念的

① 李彬. 大众传播学[M]. 修订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82.

② 姚君喜. 中国当代社会的传播结构分析[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5(5):73-80.

③ 梅俊. 图绘新闻传播结构面像: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结构化理论[J]. 新闻界,2015(11):14-19.

两个传统：社会学传统和符号语义学传统，共享说、影响（劝服）说、符号（信息）说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传统^①。但无论怎样，社会学传统的传播定义，往往会把焦点集中于社会因素对传播结构的制约和影响；符号语义学传统的传播定义，就会偏重于媒介信息本身的内容和形式。这两者所代表的不同研究范式都具有自身的学科特征，不能说用“实体间的关系”来解释“结构”的方式就是静态的传播结构研究，从传播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互动性上考察就是动态研究，研究视角的差异性并不能作为区分传播结构动静之别的标准。

3. 传播结构的微观与宏观

任何传播结构都不是以一种静态的方式运转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多或少与外界系统相连并被重新改造、建构、重组，其纷繁复杂的结构也会进行自我调适以便继续稳定运行。传播理论中的系统模式很好地将这一过程加以理论化，使传播结构的“解构”与“建构”的模式得以被精确表述，但它最大的缺点是只关注可以被观察到的结构，忽略了传播过程的其他方面，用了一种宏观的视角去考察整个传播结构，如社会学色彩的传播结构研究就是一种宏大社会理论的体现，但无法展现媒介或者个人在传播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因而研究传播结构时，绕不开对微观的传播结构和宏观的传播结构进行理论上的梳理。

（1）微观传播结构主要集中在传播过程中的某个方面、某个层次、某个阶段里。如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及其团队在美国伊利县的调查研究中就发现，信息从媒体机构流向舆论领袖后，再由舆论领袖传递到对信息不太敏感的人群中，流动的信息在传播的第二个层级中的效果被舆论领袖与其追随者之间广泛的人际传播而加以放大，这也说明了小群体传播（人际传播）在信息流

^①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3.



动和意见改变上的重要性^①。虽然拉扎斯菲尔德所提出的舆论领袖、两极传播等概念被划归到“有限效果论”中，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它们与“把关人”“创新扩散”理论等都是对微观传播结构的研究成果。

(2) 宏观传播结构研究主要聚焦于将传播过程与宏观的社会结构结合起来考察的理论研究视角。如田中义久提出的“大众传播过程图示”，就将人类的交往活动分为（符号）信息交往、物质交往、能量交往三种类型，其中（符号）信息交往过程也属于传播过程，它是建立在物质交往和能量交往活动基础之上的，这个图示也成为第一个基于唯物史观的系统模式^②。应当说，不管是微观传播结构还是宏观传播结构，都是进行传播结构研究的重要视角，社会结构制约着传播结构，传播结构也影响着社会结构，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

4. 传播结构研究的媒介化背景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传播结构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三个分析传统展开，分别是结构分析、行为分析和文化分析。结构分析所探讨的问题集中在社会结构与媒介系统对内容类型的影响上；从行为分析上看，个体行为特别是与传播信息的选择、处理和反映（即媒介利用和影响）有关的内容是它的兴趣目标；文化分析则主要被应用在意义和语言方面以及特殊社会环境和文化经验的细节上^③。虽然学者们都持有各自的分析视角，但这三种分析传统都建立在现代传播的基础上，即传播的媒介化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信息的生产、传输和接收的形式，传播的状态、功能、结构出现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如汤普森所言，大众传播的到来，特别是19世纪

① 胡翼青. 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255-261.

②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58.

③ 丹尼斯·麦奎尔.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 [M]. 崔保国, 李琨,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16-17.

报纸的兴起以及20世纪广播的出现,对于现代社会特有的互动经验与原型模式具有深刻的影响^①。一方面,信息的“传输”与“扩散”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信息流动速度的加快使传播结构的不稳定性持续上升,原有的静态描述显得过于简单化,结构中的各方关系也难以估计;另一方面,传播技术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集中,传播与权力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传播结构体现为社会关系模式愈发明显。

有学者认为,人类传播的真正内涵,无非就是意义的碰撞、交流和建构的过程,在传播的意义构建中,体现出人们对社会关系的确认^②。事实上,对传播结构变迁的理解需要与时代背景相结合考虑,传播媒介的现代化发展深深地改变了人与外界之间的关系,信息环境的加入制约着人的认识与行为,媒介成为人的延伸,传播媒介在信息的“扩散”和“接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传播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派就认识到了现代社会中媒介化的高度集中对社会带来的诸多后果,他们主要关注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下大众传播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征,这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不谋而合。不过,政治经济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过多地关注传播本身的结构问题,只是将传播媒介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加以对待,依旧是一种宏大的社会传播研究分析法。而作为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其著作《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一书中将传播过程按“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的过程来分析,提出了信息的话语形式在传播交流中占有一个特殊位置,“编码”和“解码”的诸多环节是确定环节^③。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虽然延续了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将研究的目光

① 约翰·B. 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M]. 高钰,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216.

② 姚君喜. 传播结构与社会话语生产 [J]. 当代传播, 2009 (6): 7-10.

③ 胡翼青. 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10.



集中到了传播过程中媒介在分析文化和结构关系中的中心地位上，没有将传播媒介置于宏观权力中而无法自拔。正如吉登斯指出，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①。传播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再造了社会结构，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传播结构自身独特的结构和形式，这是在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下产生的，但这种制约关系并不是直接的、无条件的和一一对应的，而是一种映射。如果把“结构”指向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和资源的话，那么，现代社会中的“传播结构”就是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以映射方式获得的运行规则和形式。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方法及创新之处

1.3.1 研究的基本思路

(1)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去考察意识形态在技术、经济以及政治三大维度构架中传播的基本形态、基本结构、基本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2) 通过对意识形态传播结构的深层分析，探索并揭示意识形态在媒介、资本和权力三种要素制约下传播的基本规律。

(3) 在整体上充分理解和认识意识形态传播过程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传播的改善提出方案。

研究的难点在于：意识形态结构与意识形态传播结构关系的梳

^① 安东尼·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M]. 李康, 李猛,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89.

理；意识形态传播的动态呈现和基本特征。

1.3.2 研究的主要方法

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方法，在吸收国内外相关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综合归纳法、系统分析法，加之将理论阐释与具体情境相结合，力图解析意识形态传播的运行轨迹和形态。

1.3.3 研究的创新之处

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去把握意识形态传播结构的内在逻辑，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意识形态在媒介、资本和权力共同作用下的具体传播状态，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理论参考。